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2.03.007

## 20 世纪美国黑人大迁徙与南部三农问题之关系

张 准

(四川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1)

**摘 要:** 南北战争后, 美国南部长期面临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民贫困、农村社会发展缓慢等三农问题。上述问题与南部的种族问题相互交织, 加剧了南部社会的落后与黑暗。这其中, 南部黑人受害最为深重, 他们被迫大规模迁徙到美国其他地区。20 世纪美国有两次黑人大迁徙的高潮,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有 600 多万南部黑人迁徙。美国南部的三农问题是黑人大迁徙的经济原因, 但黑人大迁徙又反过来推动了三农问题的解决, 由此可见迁徙自由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20 世纪; 黑人大迁徙; 美国南部; 三农问题; 迁徙自由

**中图分类号:** F299.712; F37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2)03-0055-07

**引用格式:** 张 准. 20 世纪美国黑人大迁徙与南部三农问题之关系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7(3): 55-61.

## Effect of the Great Migr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in the 20<sup>th</sup> Century on the Three Rural Issues in the American South

ZHANG Zhun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he South had long been confronted with the three rural issues such as the backward of agriculture production methods, poor peasants, and slow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are intertwined with the racial problems in the South, which exacerbate the backwardness and darkness of the South. The African Americans there suffered the most, and they were forced to migrate to other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a large scale. In the 20<sup>th</sup> century, there were two great migration peaks of African Americ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Till the 1970s, more than 6 million African Americans had migrated out of the South. The three rural issues of the South were the economic reason for the great migr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great migration promoted the solution of the three rural issues. It shows that the freedom of immigration is indispensable for solving the three rural issues.

**Keywords:** 20<sup>th</sup> century; great migr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s; American South; three rural issues; immigration freedom

收稿日期: 2022-01-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南北战争后美国南部地区三农问题研究”(17BJL022)

作者简介: 张 准(1978—), 男, 四川郫县人, 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经济史。

对于美国南部的概念,国内外学界有多种解释,本文中的美国南部是指南北战争中脱离美联邦并参加南部邦联(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直译为美利坚联盟国,通常称作南部邦联、邦联)的11个州,即南卡罗来纳、密西西比、佛罗里达、亚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弗吉尼亚、阿肯色、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州(按其在美国内战前退出联邦的时间为序),这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定义。南北战争后,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同时,南部不仅长期停留在农业社会,而且面临着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民贫困、农村社会发展缓慢等三农问题<sup>[1]</sup>。这种具有美国特色的三农问题与南部根深蒂固的种族问题相互交织,加剧了内战后美国南部经济贫困、政治黑暗、文化保守的面貌,而南部黑人更是因此受尽折磨。苦难的生活迫使南部黑人“用脚投票”,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的60多年中,有600多万南部黑人迁徙到美国其他地区(北部和西部)<sup>[2]8</sup>。这场发生在一国内部、特定种族的大规模迁徙运动规模之大、历时之久,世所罕见,其对美国黑人种族的命运和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具有重大影响,美国史学家称之为“美国黑人历史中继解放之后最重要的事件”<sup>[3]</sup>、“美国黑人生活历程中的分水岭”<sup>[4]</sup>。南北战争后,美国南部的三农问题是黑人大迁徙的重要原因,而黑人大迁徙反过来又有助于缓和、解决南部的三农问题。

## 一、南北战争后美国南部三农问题与种族问题之关系

内战后的美国南部,小农经济的租佃制、债务束缚、单一的棉花经济三大问题彼此依存、相互强化,形成了一种顽固低效、受制于棉花市场波动、缺乏技术创新需求和动力的农业生产方式。因此,在内战后,当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走上列宁所定义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时,南部农业却走上了“普鲁士道路”,即“农奴制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经济,同时分化出为数很少的‘大农’,使农民遭受几十年最痛苦的剥夺和盘剥”<sup>[5]</sup>。不成功的战后重建和错误的发展道路不仅使美国南部农业沦为弱势产业,更使广大南部农民沦为弱势群体,最终导致

严重依赖农业的南部沦为美国最贫困落后的地区,就此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三农问题。此问题长期困扰美国南部,直到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才开始得到解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以基本解决。而其对南部社会的影响之深远,时至今日仍清晰可见——目前美国人均收入最低的10个州中就有5个在南部,而南部11个州中仅弗吉尼亚州的人均GDP能进入美国前20位<sup>[6]40</sup>。南部尤其是内战前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最发达、内战后三农问题最突出的“棉花地带”(内战前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占主导地位、内战后仍然以棉花为主要作物的地区,大致东起大西洋沿岸的南卡罗来纳州,西至得克萨斯州东部,以墨西哥湾平原的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三州为中心<sup>[7]31</sup>)诸州仍是美国最贫困的地区。

从1877年南部重建(重建是美国南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大致从1865年内战结束到1877年民主党完全控制南部诸州政权为止,目前多数学者认为重建以失败告终<sup>[6]36</sup>)结束到罗斯福新政以前,南部几百万黑人租佃农堪称美国社会最悲惨的群体,其经济上极端贫困,政治上毫无权力,甚至生命安全都经常受到私刑威胁,内战后美国南部的三农问题确实容易被简单化地视作种族问题或黑人问题。

### (一)美国南部三农问题与种族问题密不可分

内战后,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南部种植园无以为继,几百万除了名义上的人身自由外一无所有、世代以来除了种棉花外一无所长的黑人无以为生。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种植园主纷纷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黑人或贫穷白人,绝大部分被解放的南部黑人成为租佃制的谷物分成农。这种谷物分成农与美国其他地方乃至中国1949年以前的普通租佃农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没有最基本的生产乃至生活资料,均需向种植园主(严格说来此时已转型为地主,但许多过去的种植园主在内战后仍保留部分肥沃土地自己耕种,故国内外学者大多仍以“种植园主”称之)赊购;在收获后先按约定的比例用收获物向种植园主缴纳地租(此之谓谷物分成),再以名义上属于自己的剩余收获物连本带利(利率通常高达25%<sup>[8]</sup>)折价归还赊购款项。作为条件之一,分成农没有经营自主权——种植园主迫使其长期从事单一的棉

花种植，甚至不允许其为家庭种些口粮（主要原因一是为了确保农民继续赊购粮食、难以摆脱债务，二是棉花市场高度成熟、交易成本低）；而其生产的棉花在交租还债后即使还有剩余，也只能出售给种植园主。通常情况下，种植园主向农民赊销生产、生活资料的价格远远高于市场价格，而收购棉花时则会强制压价。更有甚者，由于内战前的南部法律规定教奴隶识字是犯罪行为，内战结束之初的南部黑人几乎全是文盲，种植园主和无良商人往往借此做假账来盘剥黑人农民。地租、高利贷、双轨价格、强制性压价收购、做假账等多重剥削使得许多谷物分成农全家终年劳作却仍然欠着种植园主的债。一位出生于佛罗里达州的黑人回忆，在其童年的 20 世纪 20 年代，“在佃农制下，只有种植园主可以把谷物拿到市场上去卖或者把棉花送到轧棉厂。佃农只有得到种植园主的许可，这些东西才真正属于他。待种植园主扣除提供的一切东西——种子、化肥、衣服和食物——经结算之后，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佃农了。”<sup>[2]55</sup> 追根溯源，南部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内战和战后重建未能解决被解放黑人奴隶的土地问题，导致内战后的南部农业走上了错误的发展道路；而三农问题的最大受害者亦是占南部黑人中绝大部分的黑人农民。所以，南部的三农问题确实带有明显的种族色彩，容易被简单地视为黑人问题。

## （二）美国南部三农问题不是纯粹的种族问题

虽然内战前南部的种植园主和内战后的大地主基本上全是白人，但白人小农在南部农民中也占有相当数量，并与内战后的黑人租佃农一样备受折磨。内战前夜的 1860 年，南部诸州共有奴隶主家庭 38.4 万户，无奴隶的自由人家庭 151.6 万户（上述数据包括少量自由黑人家庭和极少量拥有奴隶的自由黑人家庭）。换言之，约 3/4 的南部自由人是没有奴隶的<sup>[7]44</sup>，他们大多以务农为生。但由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显然无法与奴隶制种植园竞争，南部的白人自耕农大多居住在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的丘陵、山区，其主要为自己的家庭准备粮食，偶尔种少量棉花<sup>[9]711</sup>。其中，大多数人生计艰难，被称为“穷白人”，在南部白人社会中处于最底层。而内战“永久地改变了南部白人自耕农的独立生活方式”，一是因为战争造成其财产大量损失，

二是“战后一连串的农业歉收使他们的情况变得更糟糕”<sup>[9]711</sup>。总之，内战后多数南部白人小农与黑人租佃农一样要靠借贷度日，被迫种植更多的棉花并以未来的收成为抵押。1860 年，白人小农生产的棉花占南部棉花产量的 10%，到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这一比例已升至 40%，足见白人小农也日益受制于借贷资本。相应地，“许多原来拥有土地的人此刻也沦落到分成租佃农民依赖他人的困境，只能租种他人的土地。”<sup>[9]711</sup> 1889 年，阿肯色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分别有 75% 和 70% 的白人小农无力偿还债务<sup>[10]</sup>。由此可见，内战后南部的三农问题是不分种族的，白人小农与黑人农民一样是受害者。

## 二、20 世纪美国黑人大迁徙的两次高潮

1877 年南部重建失败后，面对日益恶劣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南部黑人开始谋求迁徙，当年南卡罗来纳州甚至有部分黑人试图移民到非洲的利比里亚（最终于 1878 年仅 206 人成行）<sup>[11]392-393</sup>。1879 年南部黑人移民堪萨斯州（位于美国中西部，与南部相邻）的行动被当时的媒体称为“黑人大移民”。但由于堪萨斯当地居民的严重敌意，实际移民人数估计仅 0.6 万~2.5 万<sup>[11]393</sup>。1890 年以后，南部黑人向外迁徙有加速之势。1890—1900 年，南卡罗来纳州有 6.5 万黑人迁出，弗吉尼亚州有 7.1 万黑人迁出<sup>[12]220</sup>。

1900 年，美国共有黑人 8 833 994 人，其中 911 025 人生活在北部和西部各州<sup>[11]395</sup>，换言之，当时生活在南部的黑人占美国黑人总数的 89.7%；到了 1950 年，这一比例已下降到约 67%<sup>[11]511</sup>，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进一步下降到 53%<sup>[2]10</sup>。总的来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迁徙到北部的黑人数量有限，主要原因在于北部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同样严重，而来自欧洲的移民又足以满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北部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20 世纪黑人大迁徙的两次高潮都与世界大战带来的战时经济景气 and 劳动力缺口有关。

###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黑人大迁徙

1914 年一战爆发后，欧洲主要国家几乎全部卷入，参战国纷纷限制本国公民移民海外，加之德国潜艇又在大西洋上频频袭击协约国商船，欧



洲对美移民人数锐减。1914年入境美国的移民还有121.848万人,1915年降至1914年的1/4,1918年降至1/10<sup>[13]</sup>。与此同时,美国利用战争初期的中立地位大发战争财。1913—1916年,美国对欧洲出口总额从15亿美元激增至38亿美元<sup>[12]389</sup>。对欧贸易特别是军火贸易带来巨大的需求,美国工业(当时主要集中在北部)开始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在1917年4月美国正式参战后到1918年底战争结束前,累计有近300万青年应征入伍<sup>[12]413</sup>。工业中的劳动力缺口进一步扩大,北部资本家纷纷派人到南部招工。当时的媒体报道:“招募人员会在黑人聚集的地方来回穿梭,不停地小声说道:‘想去芝加哥工作的,找我。’”<sup>[2]164</sup>据估计,1915—1918年迁往北部的黑人不下50万人。他们基本流入工业部门,其中约15万人进入铁路部门,15万人进入其他交通运输部门,2.7万人被造船业雇佣,罐头制造、钢铁、采煤和汽车等行业也吸纳了大量黑人<sup>[11]480</sup>。尽管绝大多数黑人依旧干着低技术含量、低工资且最艰苦的体力工作,但“铁路上的职业技术性工作第一次雇佣了黑人”<sup>[12]410</sup>。这种迁徙的势头延续到一战之后,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估计,20世纪20年代离开南部的黑人超过75万人<sup>[14]</sup>。

此外,南部黑人从农村就近向城市迁徙的规模也很大。20世纪20年代,南部城市中的黑人居民增加39.7万人,而农村中的黑人居民减少47.9万人;20世纪前20年,南部城市中的黑人居民累计增加48.9万人<sup>[12]219</sup>。

##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黑人大迁徙

1929年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及此后长期的经济衰退减缓了黑人迁徙的势头,但20世纪30年代仍有约40万南部黑人迁往北部<sup>[15]979</sup>。二战爆发后,美国政府一面整军备战,一面大力援助同盟国家,巨额政府开支成为经济复苏的最重要动力。而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直接参战后,其对劳动力的需求更是急剧扩张——二战爆发时,美国军队总人数为33.5万人,到战争结束前竟膨胀到1514万人<sup>[16]34</sup>;战争期间的平民就业人数也增长了近1/5。这些新增的兵员和就业者中,不仅有700多万萧条时期的失业者,还有许多过

去被认为不适合工作的少年、老者,以及几百万走上工作岗位的妇女<sup>[15]1075-1076</sup>。战争期间,北部制造业诸州和西部太平洋沿岸新兴的工厂对南部黑人敞开了大门,南部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被迅速吸收,以致每逢收获季节教育部门要安排中学生下乡支农<sup>[16]34</sup>。仅在1940—1945年间,从南部农村迁往各工业城市的黑人就有60多万人<sup>[17]75</sup>。

战争期间过度膨胀的美国农业在战后遭遇了长期的农产品过剩,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都大幅下跌。1948年,美国农民收入还占国民收入的8.9%,到1956年已降至4.1%。跌幅如此之大,还在于农业人口持续减少——仅在1956年就有10%的农业人口迁往城市。这种情况在南部尤其明显。在农业机械化进程加快、过去长期占经济主导地位的棉花产业急剧衰退、最低工资制度导致南部企业裁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940—1970年南部共有458.6万名黑人迁出<sup>[18]155</sup>。

## 三、美国南部的三农问题与黑人大迁徙相互影响

### (一)美国南部的三农问题是黑人大迁徙的经济原因

如前所述,20世纪美国黑人大迁徙的基本方向是从南部迁至美国其他地区(主要是北部)。南部黑人之所以在60多年(如从南部重建失败的1877年算起则持续近百年)的漫长时间里持续不断地背井离乡,根深蒂固并在内战后变本加厉的种族歧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重建失败后南部形成的种族隔离制度、黑人长期被视为二等公民备受压迫尤其是惨无人道的私刑威胁是政治原因,而南部三农问题长期持续、农民极端贫困可视为经济原因。在20世纪初,“南方是全国最贫穷的地区,而在南方内部,黑人又是最贫困的。”<sup>[19]269</sup>

从内战后到罗斯福新政前,南部农民尤其是南部黑人农民普遍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与全国其他地区形成强烈反差。内战前夕的1859年,南部棉花种植园中黑人奴隶的年均产出为147.93美元,而1879年南部黑人谷物分成农的年均产出仅74.03美元,整整下降了一半<sup>[20]382</sup>。直到1890年,南部人均收入才恢复到内战前的水平,但其占全国人均收入的比例已由内战前的3/4降至1/2<sup>[19]263</sup>。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农妇回忆19世纪90年代,“我

家收成最好的一年是挣了 179 美元……大多数年份都只有 50 或 60 美元”<sup>[21]</sup>。内战后的南部，农民往往终年辛苦劳作却只能勉强糊口，基本没有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的可能；许多人甚至无法在还贷后自筹下一年度的生产、生活费用，只能继续向种植园主或商人赊购，从而在贫困和债务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880 年《美国棉花生产报告》指出：在南部，小租佃农场主，主要是黑人，竭尽全力都无法偿还债务是其普遍经历<sup>[22]</sup>。统计数据显示，1890 年，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黑人人均财产仅为 16.46 和 14.07 美元；更靠近北部、相对富裕的阿肯色州，1895 年黑人人均财产为 29.96 美元<sup>[23]</sup>。1930 年，南部 3/4 以上的黑人都是佃农，仍处于终年劳作却基本没有现金收入的状态<sup>[24]</sup>。耶鲁大学人类学家霍顿斯·鲍德梅克（Hortense Powdermaker）的统计结果也显示，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只有不到 1/5 的佃农在年终结算时能获得 30~150 美元的盈余（换言之就是日平均工资 9~48 美分），而其余 80% 的人要么得不到任何东西，要么发现自己还欠着种植园主的债。对此，佃农们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因为“一个种植园主如何对待自己的佃农并不会引起公众的关注。相反，和他用什么牌子的牙膏一样，这被看作是他的私事”<sup>[21]71</sup>。

## （二）黑人大迁徙有助于解决美国南部的三农问题

首先，黑人大迁徙有助于改善南部黑人农民的处境。对一战爆发后的黑人迁徙浪潮，南部主流社会最初至少在表面上是不在意甚至喜悦的，如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一家报纸写道，“随着北方黑人的增多，南方白人占的比例就越来越高”<sup>[21]65</sup>。不久以后，不仅农村中的黑人大量流出导致“棉田、稻田和烟草种植园都杂草丛生，无人采收”<sup>[21]68</sup>，城市中诸如菜市场、公路养护等低报酬的体力工作也逐渐乏人问津。南部白人开始感到恐慌，南部各州政府纷纷出台各种应对措施，如禁止北方派员前来招募黑人，用逮捕和截停等高压政策禁止黑人离开，甚至派人到北方劝说迁徙的黑人返回等。当时的媒体评论：“南方采取的高压政策和强制措施可以与苏联（从时间上看应为苏俄，笔者注）相提并论了。”<sup>[21]67</sup>然而，这些高压政策不但没有效果，反而更加坚定了黑人

离开的决心。最终，从种植园主开始，南部社会对黑人的歧视和压迫逐渐有所松动。美国劳工部的报告显示，在 1916—1917 年，“因为劳动力极度匮乏”，“佐治亚州奥尔巴尼附近的一位种植园主收起了自己的鞭子和手枪，此外他还习惯了自己驾车以及在佃农面前低声下气”<sup>[21]68</sup>。当时南卡罗来纳州的报纸曾将黑人迁徙归咎于对黑人的私刑迫害：“如果因为犯了一点点小错就被处以私刑，你还会待在南卡罗来纳州吗？”<sup>[21]66</sup>而此后不到 10 年，亚拉巴马州的报纸声称：“自从 1924 年，私刑的数量就明显减少。”<sup>[21]531</sup>据统计，1900、1910、1920、1930 年代美国黑人遭遇私刑的年均数量分别为 75.8、56.3、28.1 和 11.9 人。在 1922 年及以前，除个别年份外，每年遭遇私刑的黑人数量不低于 50 人；1923 年降至 29 人，1924 年为 16 人，此后除个别年份外均未超过 20 人；从 1936 年开始则再也没有超过 10 人<sup>[25]</sup>。这些数据都可与上述媒体报道相印证。

其次，黑人大迁徙有助于南部农业走向规模化大生产。如前所述，南部三农问题的基础之一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1940—1969 年，美国农场总数从 300.7 万个下降到 116.1 万个，其中南部的农场数量减少了 61%；而黑人农场（美国的相关统计中，租佃农包括南部的谷物分成农都被称为租佃农场主，故此处的黑人农场应理解为黑人经营的农场，不涉及农场的所有权）的数量，1920 年为 925 710 个，1940 年降至 681 790 个，1950 年为 559 980 个，到 1970 年只剩下 87 393 个<sup>[17]78</sup>。不管是黑人农民主动放弃还是遭遇兼并的结果，客观上，黑人农民的大量迁出有助于促进土地集中、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和机械化生产。二战期间大批农村青壮年（不仅限于黑人）走进军队和工厂，使得南部在内战后第一次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采摘棉花的工资水平从 1930 年的每磅 1 美分增长至 1946—1947 年的每磅 7 美分，而 1945 年机械采摘棉花的平均成本仅为每磅 1.4 美分<sup>[18]118</sup>。人力成本的上升迫使南部农场主采用机械化生产。1945 年，南部每磅棉绒的平均生产成本是 16.6 美分，而在全面机械化生产加大规模种植条件下可降到每磅 7 美分。机械化大生产与传统的手工劳动之间巨大的成本差异，最终导致在大约 20 年的时间里，南部棉花生产者由二战前的

100多万人剧减至5万人<sup>[18][18]</sup>。尽管这一剧烈变化导致大量黑人农民流离失所,但是南部农业从此不再是落后和弱势产业,三农问题中的农业问题得以基本解决。

#### 四、从美国黑人大迁徙看迁徙自由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以前,美国南部广大黑人除了在建时期曾短暂地享有并行使选举权、参与南部政治生活外,在政治上基本没有权力,无法用手投票的他们只能选择“用脚”投票。事实上,早在内战前,废奴主义者就通过“地下铁路”(从19世纪初开始,美国北部的废奴主义者潜入南部带领、帮助奴隶逃亡的线路,主要有两条干线,一条从南部经过俄亥俄州到加拿大,另一条沿着东海岸通往北部<sup>[26]</sup>)帮助黑人奴隶逃到北部甚至加拿大,《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混血女奴伊莉莎一家人一路向北步步惊心的逃亡经历便是“地下铁路”的真实写照。到1850年之前,成功逃离南部的奴隶数目,目前官方估计为10万人左右<sup>[27]</sup>。较之于内战前南部的奴隶总数,这个数目不算大;但考虑到当时南部奴隶主严密的军事统治和残忍的报复措施,这已是殊为不易,足见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亘古不变、中外皆然的。南北战争终结了罪恶的黑人奴隶制,使南部几百万黑人至少在名义上获得了人身自由,从而为此后长期的黑人大迁徙扫清了最大障碍。内战刚刚结束,就有许多被解放的黑人为寻找在奴隶制下被迫分离的家庭成员而长途跋涉。当时的媒体报道,有人“为寻找战前被卖掉的妻子和孩子,步行600英里从佐治亚走到北卡罗来纳州”<sup>[9][703]</sup>;但由于内战前奴隶很少被卖到自由州,这种以一家团聚为目的的迁徙活动一般不超出南部的地理范围。1877年南部重建失败后,南部黑人向外迁徙之势再起,其经济原因是三农问题下黑人农民的极端贫困,政治原因是重建失败后南部社会对黑人变本加厉的种族歧视和迫害。从1877年重建失败到20世纪70年代,此次黑人大迁徙持续时间近百年之久,总人数远远超过内战前的南部黑人总数(根据1860年的人口普查,南部各州有黑人奴隶约352万人,另有自由黑人20多万人<sup>[28]</sup>),其不仅

是推动解决南部三农问题的重要因素,更对南部乃至全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是世界上发达国家之一,但三农问题在美国却持续时间如此之久、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其顽固性由此可见一斑。中国当前的三农问题,虽然从成因到表现形式均与历史上美国南部的三农问题有本质区别,但美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经验仍不乏参考价值。1949年以来,迁徙自由权在具有宪法性质的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中得到确认,而在此后的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宪法中均未列入。缺乏迁徙自由是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这已基本属于学术共识,即所谓“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消灭农民”。从美国经验来看,无论几百万黑人农民是主动还是被动离开南部,20世纪的美黑人迁徙都在客观上减少了南部农业内部的小农经济成分,推动了美国南部土地集中化、农业生产机械化和农业经营规模化,是南部三农问题得以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足见迁徙自由对解决美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总的来看,国家是逐步放开对农民迁徙限制的,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总数达到2.53亿的历史峰值。目前,中国农民自由流动早已不是问题,但还谈不上自由迁徙。2013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推进户籍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sup>[29]</sup>,这是“自由迁徙”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到2020年,基本建立……新型户籍制度,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sup>[30]</sup>。相关学者指出,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机制,“让农民充分享受到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公民权利,进一步消除户籍制度障碍,加快推进城乡居民一体化建设”<sup>[31]</sup>。可以预见,中国农民迁徙自由的逐步复归与中国三农问题的逐步解决,将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 参考文献：

- [1] 张 准. 美国南北战争后南方文化变迁与南部“三农问题”之关系初探[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6(4): 48-58.
- [2] 伊莎贝尔·威尔克森. 他乡暖阳: 美国大迁移史[M]. 周 旭, 译. 北京: 文化发展出版社, 2019.
- [3] MARKS C. Farewell: We're Good and Gone: The Great Black Migration[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1.
- [4] HARRISON A. Blacks Exodus[M]. Jackson: Mississippi University Press, 1991: 37.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 第 16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205.
- [6] 张 准. 美国内战后南方重建时期的“毛毡提包客”评析[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3(5).
- [7] 何顺果. 美国“棉花王国”史: 南部社会经济结构探索[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 [8] 刘祚昌. 美国内战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8: 580.
- [9] 埃里克·方纳. 给我自由!: 一部美国的历史: 上卷[M]. 王 希,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10] SCHWARTZ M. Radical Protest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Southern Farmers' Alliance and Cotton Tenancy, 1880—1890[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77-78.
- [11] 威廉·福斯特. 美国历史中的黑人[M]. 余家煌,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61.
- [12] 余志森. 美国通史: 第四卷: 崛起和扩张的年代 1898—1929[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13] KIRKLAND E C. A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Life[M].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9: 470.
- [14] 托马斯·索威尔. 美国种族简史[M]. 沈宗美,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267.
- [15] 艾伦·布林克利. 美国史[M]. 13 版. 陈志杰, 杨天旻, 王 辉,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16] 张 准. 美国内战后南部地区城市化与三农问题之关系初探[J].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 2013, 29(1).
- [17] 胡锦山. 20 世纪美国南部农业经济与黑人大迁徙[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4).
- [18] 王崇兴. 制度变迁与美国南部的崛起[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 [19] 斯坦利·L 恩格尔曼, 罗伯特·E 高尔曼. 剑桥美国经济史: 第二卷: 漫长的 19 世纪[M]. 王 珏, 李淑清,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20] 杰里米·阿塔克, 彼得·帕塞尔. 新美国经济史: 下册[M]. 罗 涛, 李 游, 杨 靖,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382.
- [21] COOPER W J. The American South: A History: Volume 2[M]. New York: McGraw-Hill, 1990: 265.
- [22]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Report on Cotton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art II[R].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4: 335-424.
- [23] 吴 浩. 失去的机会: 1866 年美国“南部宅地法”与黑人获取土地的失败[J]. 史学月刊, 2015(2): 75-85.
- [24] 约翰·马克·法拉格, 玛丽·乔·布尔, 丹尼尔·切特罗姆, 等. 合众存异: 美国人的历史[M]. 王 晨, 李书军, 丁 维, 等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668.
- [25] 常 慧. 浅析美国内战到二战期间对黑人实施私刑的原因[D].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2018: 18.
- [26] 李 宁. 美国废奴运动的兴起和发展[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5(2): 88-94.
- [27] 李 青. 论美国十九世纪逃奴问题[J]. 世界历史, 1985(2): 10-17.
- [28]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 亨利·斯蒂尔·康马杰, 威廉·爱德华·洛伊希滕堡. 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 上卷[M].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817.
- [29] 温家宝. 政府工作报告: 2013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N]. 人民日报, 2013-03-19(001).
-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14-07-31(008).
- [31] 胡光伟, 廖江威, 张 明. 基于 TOPSIS 模型的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评价[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5(4): 95-103.

责任编辑：徐海燕